

百年《桃花扇》传奇思想主题衍变与论争

张 涛

摘 要:《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一部传奇名剧,与洪昇《长生殿》并称“南洪北孔”。但因孔尚任为儒家先师孔子“后裔”,以及此剧以“史笔”书写南明兴亡,兼采“春秋笔法”,又处清初文禁之时,作者创作《桃花扇》的主题思想不免过于“隐晦”。自晚清以来的一百年间,围绕剧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意旨争论不休,一时间,“颂扬爱情”“兴亡之叹”“爱国思想”“现实主义”“民族精神”“拥清反清”“拥明寄托”“叛徒否定论”等主题说纷纷登场。《桃花扇》主旨论争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笔者全面梳理了百年《桃花扇》传奇主题思想的研究的衍变因传关系,认为学术界对《桃花扇》主题的百年论争经历了民国时期“民族思想张扬”、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题”“现实主义”“叛徒否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背景下《桃花扇》主题研究的“拨乱反正”、21世纪“理论与批评”的现代与多元这样四个发展阶段。这一百年论争所表现出来的背景思潮的嵌入式研究理路、思想文化的戏曲浸染、批评范式的现代转型等皆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桃花扇》 主题思想 衍变与论争 百年

DOI:10.15915/j.cnki.cn11-1172/j.2023.02.009

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世纪转型期的学科回顾和展望,一些学人对《桃花扇》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主要有吴新雷的《孔尚任〈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孟庆丽的《新时期以来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研究述略》(《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仲冬梅《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朱伟明的《二十世纪的〈桃花扇〉研究》(《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邓黛的《近十年来〈桃花扇〉研究综述》(《戏曲研究》2002年第2期)、刘政宏的《二十世纪〈桃花扇〉研究》(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张芳的《艺术批评、现实批评与学术批评——民国〈桃花扇〉主旨批评研究》(《南大戏剧论丛》2022年第1期)等。以上学者从作家生平考证、版本辨识、文本分析、思想意旨、艺术特色、剧本改编、传播接受、海外翻译等方面对孔尚任及其《桃花扇》展开了全面的回顾总结。笔者在此文重点梳理《桃花扇》在思想主题方面的百年衍变过程。

一、清末—1949年:民族主义主题的张扬

这一时期以吴新雷刊发于《南京大学学报》的《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为代表。该文发表于即将跨入新世纪前的1999年,作者选择了前半世纪(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国维、吴梅、梁启超为代表,分四个时期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百年孔尚任及其代表作《桃花扇》研究史,指出王国维、吴梅二人从艺术角度推崇《桃花扇》为“有人格”(即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化)(《文学小言》)、“与诗文同其声价”(1918年7月吴梅《桃花扇传奇跋》),“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但二人研究突出了“艺术性”而忽略了“思想性”^①。

梁启超作为维新派启发民智代表,其研究《桃花扇》在于“振国民之精神”。1903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重点突出《桃花扇》的“故国之感”与“种族之戚”,“读此而不油然而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②。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大多沿袭梁氏“民族主义”思想主旨,把《桃花扇》定性为一部“写亡国哀感的历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地理社群文献整理与明末清初文学派别思潮图谱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BZW1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3J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涛,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传奇。

剧”。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中华书局在昆明重印梁启超的《桃花扇注》,还是把《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选入中学国文课本,其目的在于挖掘作品的“民族主义情节”。吴新雷又以1943年4月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方霞光的文章《校点桃花扇新序》为例,指出《桃花扇》“微言大义,有所寄托”主旨,“道出了当时国难当头、民族救亡者的识见”^③。

特别是在中国全面抗战时期,挖掘《桃花扇》所蕴含的“民族大义”为时局服务愈发“明显”和“强烈”。这里还有几篇文章吴新雷没有关注,兹介绍如下。一篇是絮因1935年刊发在《民族文艺》第5卷的《桃花扇里的民族魂》。作者以“华夷之辩”视角痛诉满清之亡我民族,《桃花扇》正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不管是李香君一样的名妓,还是柳敬亭、苏昆生这样的下层艺人皆“志节可敬”。作者用“侧写法”阐扬“民族魂”,以至于发出“还我河山”的誓言壮语,文中言:

《桃花扇》这部书,一般人往往以为她只是描写儿女离合之情的作品,而不知她正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以南明亡国为主要题材,中间叙述马阮的奸恶,史可法的精忠,以及复社诸生朝堂正士的横遭虐杀,贤士的高蹈,名妓的忠良……事实既已如此可歌可泣,再加上作者高深的技巧渲染的得法,遂使明末无数的忠诚义士皆能活跃纸上,民族兴亡的意识深深种入后人心曲而不能磨灭,虽当时因为文字之狱甚严,不敢明写满清罪恶,然而一言一语的暗示,已够亡国人民的心血沸腾。“还我河山”的誓语,固不必勒之于石,其潜势力实足推翻满清而有余了。

李香君的慷慨尚气节,柳敬亭,苏昆生的仗义救友。他们都不是诗书名教中人,然而他们的志节却如此可敬,这是民族魂的一种侧写法。

总之,《桃花扇》一书,在文学上是一部极名贵的传奇,在民族的立场上讲,更是一部极难得的信史,满清入关二百余年,我汉族意识之不即消沉而终于复活者,桃花扇之力,不在少数^④。

另外一篇需要关注的是方遐君1942年发表于《国防研究》第1卷第1期的文章《桃花扇的民族气节》,该文认为《桃花扇》为“美刺”之作,蕴含“大义微言”:

作者表彰草野小民的忠义,正以羞愧那些士大夫们的无耻,此其一。又,申明忠奸之辨,

指出亡国之原,山河迁变,舆图换稿,那是谁的罪责?此其二。懂得以上两点,就可以了解《桃花扇》不能拿他与平常的传奇戏曲作品一般看待了。作者全部传奇中只于搜寻山林隐逸一事,似乎对于清政有点不满,但只在未出中由老赞礼骂了皂隶几句说“啐!徵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间接又间接的表示表示而已。此外无涉及清朝半字,不能责骂就半字不提,亦可见其言外之意。这不正是所谓“无声的责骂”么?^⑤

该文标题《桃花扇的民族气节》虽言及“民族气节”,但文中却无“民族气节”字句,而是在分析作者生平时代及剧中人物时处处突出“草野小民”的“忠义”,于“无声的责骂”中彰显他们的“民族之气节”。

因此,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无数中华儿女仁人志士胸怀民族大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们或投笔从戎,或摇笔呐喊,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抗敌斗争中,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桃花扇》传奇正契合了时代语境,有作者就把它改编成话剧、电影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激发中华儿女抵御外辱的坚强意旨。《桃花扇》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挖掘“民族主义”思想的教育课本,很多文人志士赋诗歌咏,出现了很多《桃花扇》“题咏诗”。这是学术界所未曾关注的。如顾素颜1915年刊发于《香艳杂志》第6期的《题桃花扇传奇后》:

云山一角认前朝,宫草宫花恨未消。何处春光最潇洒,秦淮烟水白门桥。

非烟非雾隔帘栊,玉泣珠啼褪粉红。扇底桃花春有主,不随凡艳嫁东风。

闲抛团扇又新秋,南内凄凉感旧愁。别院梦回弦拉杂,此声不是古凉州。

家在芳塘西复西,青楼重到意犹迷。桃根桃叶人何处?散乱秋烟草满堤。

长斋佛黯黯诗魂,贝叶熏香静掩门。清磬一声帘不捲,梨花淡白月黄昏。

新词绝妙燕笺称,雅乐中朝一代兴。为问铜台沈旧瓦,有谁歌舞望西陵。

故国荒凉岁月增,残山胜水梦觚棱。梨园流落渔樵里,细雨斜风唱秣陵。

抛却朱翹翡翠茵,由来情性莫辞贫。他年若列东林传,可许金钗寄党人?^⑥

这首诗叙写南朝宫殿与李香君秦淮青楼的“凄凉”,为“故国荒凉”与“梨园流落渔樵”而平添一份“旧愁”,亡国之悲跃然纸上,并且发出“他年若列东林传,可许金钗寄党人”的人生追问,暗含民族振兴的

无限渴求。翌年(1916年),章汤国黎在阅读《桃花扇》传奇后亦在《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3期写诗一首《读桃花扇传奇感赋》:

北风卷地起狼烟,南殿笙歌醉舞筵。半壁江山成底事,无情流水自年年。

天堑长江昨夜开,胡笳声逐铁骑来。更无人宴薰风殿,酒冷灯昏鬼哭哀。

匝地烽烟急暮笳,莫愁湖上夕阳斜。苍生白骨埋荆棘,帝子深宫尚看花。

燕语莺啼惹恨多,六朝金粉付流波。敬亭檀板昆生曲,翻作殷宫麦秀歌。

翩翩裾履旧风流,文酒笙歌彻夜游。灯舫清帘如昨盛,岂惟商女不知愁?

荆棘铜驼恨渺茫,苍天无语挂斜阳。痴心为问啣泥燕,楼向谁家新画梁。

歌衫舞袖汉宫春,声鼓喧阗牧马营。一局残棋争着定,又闻遗老话昇平。

羽书旁午遍征兵,多少男儿谁请缨?陵寝无人埋白骨,降幡又出石头城。

玉玺金瓯付劫灰,空余往事令人悲。茫茫前路风云急,莫使哀人负我哀。^⑦

如果说顾氏之作在一亡国之“悲”字,而章汤国黎则把批判的触角伸向了“南殿笙歌醉舞筵”的误国“罪臣”,流露出对抗击北兵而“苍生白骨埋荆棘”的前线将士的同情,以及对帝王将相“深宫尚看花”的深切痛恨。诗人运用“胡笳”“北兵”等意象来凸显“民族”大义,使国人警醒。总之,在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时期,学人对《桃花扇》传奇的研究更多赋予其“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蕴。

二、1949—1978年“爱国思想” “现实主义”与“否定论”

(一)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1962年之前的《桃花扇》研究,吴新雷认为是开创“新风气”,做出“新成绩”阶段。对《桃花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光明日报》,主题论争由民国时期的“民族性”问题转到了“爱国性”思考。马雍在《光明日报》1954年5月24日副刊《文学遗产》第7期发表《孔尚任及其〈桃花扇〉》,认为孔尚任具有“故国”之思,剧中死难诸君为“民族烈士”,从而凸显了《桃花扇》的“民族意识”^⑧。关于《桃花扇》主题思想的讨论这一年异常“热闹”就在同年8月29日,陈志宪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18期刊发《关于〈桃花扇〉的一些问题》,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具有极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杰出作

品”^⑨。

翌年,宋汉濯在《西北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发表《〈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赵俪生在《文史哲》(10月号)上发表《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肯定了“《桃花扇》蕴含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⑩。王季思于1956年校注《桃花扇》,并在前言中亦肯定了该部传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充满现实主义精神。《桃花扇》传奇一时间成为具有导向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标签。这样的主题思想显然带有为现实服务的政治关怀,吴新雷认为这是“学者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来评介古典文学遗产”的结果^⑪。

(二)“叛徒否定论”风潮。1962年至于“文革”兴起,吴新雷称之为“否定之否定”阶段,他说“自1962年9月至‘文革’,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左倾思潮泛滥,学术界批判成风。哲学上批判‘合二而一’和‘时代精神汇合论’,政治上批判清官和‘有鬼无善论’,史学界因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声讨叛徒,文艺界是批判被江青和康生点名的戏剧电影。流风所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怪论。在这样的形势下,《桃花扇》在劫难逃,不仅遭到批判,而且在‘文革’中被彻底否定了。”^⑫争论仍然在《光明日报》展开,焦点是侯方域是否为“叛徒”,李香君是否“坚持反革命气节”。

争论源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欧阳予倩为抗战需要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十一场的京剧,剧中侯方域成为投降清政府的“叛徒汉奸”;1946年再次改编时,侯方域“身上穿的是清制的行装,箭衣马褂,脑后拖着辫子”,完全是一副“汉奸形象”。当20世纪60年代中央实验话剧院重演此剧时,众人对剧本侯方域的“汉奸”结尾颇有争议。张毕来在1962年6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煞风景”的侯方域说起》,认为结尾侯方域“着清代衣冠”辜负了李香君的“忠贞”,可谓大煞风景^⑬;勉仲同年8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钱牧斋与侯方域》亦赞同此说^⑭;而刘知渐对此不甚赞同,于是在1962年8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也谈侯方域“出家”问题》,以侯方域“非真降清”为由替侯方域“翻案”^⑮。关于侯方域的“降清”“叛徒”问题一时成为学人关注焦点。

1962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穆欣的文章《不应当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评刘知渐〈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该文在批判刘知渐的同时也指出“侯方域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变节分子,孔尚任为侯方域掩饰是‘封建地主阶级立

场的表现’”^{①6}。此论一出,学界哗然,跟风者络绎不绝,《应当正确评价孔尚任的〈桃花扇〉》《〈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桃花扇〉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吗》《关于〈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等文章认为孔尚任“‘站在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反动立场上’,其剧作‘为康熙的统治服务’,毫无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可言,‘孔尚任的敌视农民起义依附清朝统治者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使他对于当时社会的本质矛盾作了反动的解释’。指斥《桃花扇》的思想倾向是‘掩盖民族矛盾,美化清朝统治者’,‘宣传消极退隐,取消斗争’”^{①7}。

到了“文革”时期,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电影《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因“坚持反革命气节”而遭受江青批判,正如吴新雷所总结的“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电影〈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编者按》说:电影《桃花扇》‘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剥开《桃花扇》的所谓历史题材的画皮,暴露出它宣扬反革命气节,号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的政治目的’。全文第三节的小标题是‘宣扬至死效忠于被推翻的旧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含沙射影,恶毒咒骂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狂热歌颂东林精神,鼓吹反革命暴乱’。文中严词斥责说:‘电影中李香君的形象是作者借来表现东林精神的工具。她是一条披着桃花似的画皮的大毒蛇。我们一定要拦头打死这条毒蛇’在这样的号召下,全国工农兵群众一齐上阵,写大字报搞大批判,给电影《桃花扇》判处了死刑,连带孔尚任的原著和欧阳的改本,全都被彻底否定了,有关演员和研究工作者也都池鱼遭殃,受到批斗和迫害,‘有的同志曾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①8}

这一左倾思潮对文学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学术界也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多数学者开始为孔尚任及其《桃花扇》传奇正名,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本再版后记》,蔡毅的《应该恢复〈桃花扇〉的本来面目——论侯方域的“出家”结局》,赵景深、李平、江巨荣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与〈桃花扇〉》等皆认为该剧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思想内容是进步的”,“绝不是为了美化叛徒或鼓吹投降主义,民族意识有时相当强烈”。学术界对《桃花扇》传奇的研究又回到了它的“文学独立意义”。

三、1978—1999: 由“阶级矛盾论”

分析向广义“思想文化论”的转变

这一时期对《桃花扇》主题思想的阐释主要有

朱万曙的《近十年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综述》,该文发表于1990年,对20世纪80年代的《桃花扇》主题思想总结甚详;孟庆丽的《新时期以来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研究述略》刊发于1999年,在时间上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吴新雷的《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虽也刊发于1999年,但侧重对1978年以来《桃花扇》专著出版及新资料的发现情况进行总结,未涉及《桃花扇》研究史梳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20世纪末的2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已深入人心,学术界从“阶级分析论”“政治标准第一”的研究范式中国独立出来,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学者们各抒己见,视角多样,阐释丰富。综合朱万曙、孟庆丽两位学者文章,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民族意识说。以赵景深、李平、江巨荣《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和〈桃花扇〉》(1980)、张海琛《民族的矛盾,爱国的挽歌》(1982)、洪柏昭《〈桃花扇〉思想评价问题》(1985)为代表。(二)拥护清朝说。以戴胜兰等《谈〈桃花扇〉的思想倾向》(1981)、井维增《〈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1987)为代表。(三)悼明诚清并存说。以黄天骥《孔尚任与〈桃花扇〉》(1980)、黄卓明《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1981)、张乘健的《〈桃花扇〉发微》(1984)为代表。(四)救末世之人说。以徐振贵《〈桃花扇〉的主旨和纲领》(1987)为代表。(五)历史沉思说。以张燕瑾《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1994)为代表。

朱、孟二人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了自1978年至1999年20年间的《桃花扇》主题之争。其中陈庆惠刊发于《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的文章《〈桃花扇〉二题》需要引起关注。陈文提出“二题”说,即《桃花扇》传奇兼具“爱国”与“忠君”、“出世与入世”二元主题,该文立意仍建立在学界“主题”二元对立说基础上,他说:

孔尚任的《桃花扇》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显示出它巨大的艺术魅力。但是,对《桃花扇》思想内容的研究,由于涉及到民族问题这个敏感多变的区域和孔尚任与当朝密切合作的身世而出现了争议纷呈的局面。近来再读《桃花扇》,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桃花扇》是借抒发“兴亡之感”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还是借南明兴亡之史实宣扬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这是《桃花扇》思想内容评价中争论较大的问题。持前一观点者认为,《桃花扇》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剧渗透着对明朝深

切的悲吊、尤其集中表现在《闲话》《孤吟》《入道》《余韵》等出中;其二,表现在当年的“故臣遗老”“掩袂独坐”“唏嘘而散”的演出效果上。持后一观点者认为,《桃花扇》并没有表现出爱国思想,而是宣扬了儒家正统的忠君思想:其一,全剧并没有表现爱国思想的反清描写,反而在《先声》等出中充斥着对清王朝的赞美之词;其二,剧中褒贬人物的主要依据是忠君思想。以上两种相反的意见所列举的几个方面,各自都能在剧中找到相应的论据,这里就毋庸赘述。问题是爱国和忠君这两种思想原本是和谐统一于《桃花扇》中的,而我们的评论者却要将它们对立起来,并且长期争论不休。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爱国思想内涵演变史的具体研究和喜欢用今人的尺度来衡量古人的作品^{①9}。

学术界多把“爱国”与“忠君”二元主题割裂开来论证。“爱国”体现的是抗击外辱的“民族情节”,“忠君”乃献媚新朝的封建糟粕。“爱国”与“忠君”在多数学人笔下成为两个对立冤家而水火不容,而陈文则详细考察了“爱国思想演变史”,认为封建社会“爱国与忠君”本质一致,“乱世出世与盛世入世”同样是对“封建国家及君主的效忠”,完全统一于“忠君报国”基点上,是“忠君报国的特定形式”。

这一阶段的《桃花扇》主题思想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和新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前十年,《桃花扇》主题思想研究具有“拨乱反正”之意,朱万曙首先指出“《桃花扇》的主旨是颂清还是挽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②0}但“文革”时期的《桃花扇》主题研究却成为了“政治问题”,他说“1962年12月,《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穆欣《不应当为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一文,指斥《桃花扇》‘严重歪曲历史’,是为清王朝服务,适应其政治需要,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②1}“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展开了正常讨论。”^{②2}“正常”一词表现出这十年来学术界对《桃花扇》主题思想的研究由“政治问题”向“学术问题”的回归,但由于这一时期学人的“文革”背景,这种“回归”显得并不彻底。

这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痕迹,以及“封建糟粕”对文本的人为“践踏”。如1985年,洪柏昭在《暨南学报》第3期刊发的文章《〈桃花扇〉思想评价问题》坚持自民国以来的“民族主义”说,指出“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这种描写涉及到民族斗争的时候,就表现了作者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辉思想”,但作者在文中运用“阶级矛

盾论”分析问题,强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是农民和地主这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南明政权的建立,原意就是针对农民起义的。作者的立场,牢牢站在地主阶级的方面,他痛恨弘光小朝廷,只知宴安享乐,互相倾轧,不能扫荡‘流寇’,‘报君父之仇’”,“因此,《桃花扇》在描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涉及到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表现了反对农民起义的思想的,这方面正表现了作者阶级和时代的局限”^{②3}。这一“阶级分析论”在这一时期的《桃花扇》主题思想研究中较为普遍,并维增1985年刊发在《齐鲁学刊》第3期上的文章《〈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就明确指出,“《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是较为复杂的,对其政治倾向应从历史和阶级的观点作全面的分析”,并且只有这样,“我们的评价才能逐渐接近真理”^{②4}。把“阶级分析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唯一真理与标尺”,显然又陷入了“绝对主义”的泥潭。

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对《桃花扇》主题思想的研究带有较多的“两面性”,他们既想从传统的革命教育政治语境中脱颖而出,但又不能完全走出这一“光圈”,显得有点“小心翼翼”。但也有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利用新的文学理论,从更为广阔的哲学、宗教、思想、文化等视角切入,挖掘《桃花扇》主题思想更为广阔的“大文化”意义,力图实现新的突破。这主要以1984年张秉建在《文学遗产》第4期刊出的文章《〈桃花扇〉发微——从哲学史的角度论〈桃花扇〉》为代表,朱万曙认为“该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哲学史(侧重于宗教史)——分析《桃花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即《桃花扇》是一篇高出贾谊《过秦论》数筹的“形象的《过明论》”,具有“宗教哲学”意义^{②5}。

张秉建在文章开头就阐明他的“哲学视角与方法”是一种创新,他说“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是文学史的研究更变角度,也是哲学史的研究扩大范围。”^{②6}“更变角度”表明作者“求变创新”意识相当强烈,也流露出作者对“庸俗社会学”与“阶级分析论”研究方法的“强烈不满”,他说:

至于对孔尚任为什么以出家入道作结这个问题,一般论者普遍认为孔尚任有消极出世思想,并不足取。何以故?则归结为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古人当然不及今人高明,旧时代的地主阶级文人也当然未能超脱阶级的局限,用这个公式去套中古文学史任何作品,似乎是放之各篇而皆准,虽然省力,但并不省事,因为文学史上的许多复杂现象并未由此得到解释^{②7}。张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旧”的“庸俗社会学方

法论”“套用中古文学史任何文学作品”虽然“省力”,但不“省事”,“因为文学史上的许多复杂现象并未由此得到解释”。有鉴于此,张秉建才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哲学”学术范式来解读文学现象,他说:

中国中古的正统哲学,特别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形成的貌似广大精微而实则凝固鄙陋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对思维与存在这类所谓纯哲学命题探讨不足;一方面,又忽视了哲学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联系,所谓“形下之学”和“词章之学”,都是正统派哲学家所不屑顾及的。由于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为时不算很久,不少问题还有待于探讨,用西方哲学的特定范畴来生吞活剥地印证中国哲学,难免牵强比附之病;用中国古代哲学的现成讲法来解释,又不免重新落入前代为儒林作学案的窠臼^{②8}。

细读该文,我们发现,作者之所以批判中国中古时期“正统哲学”“凝而鄙陋”,既因为这种哲学的“形而下”特征限制了对“思维与存在”的思辨性思考,又因为正统哲学“为儒林作学案”而“不屑”于“形而下”的“词章之学”,从而割裂了“哲学”与“文学”的普遍联系。张文有破有立,他同时指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应该是无比丰富的,揆诸古人‘六经皆史’之义,凡天壤间所见的一切文字都不妨看做思想史的资料。特别是中国的中古时期,许多非正统而往往是先进的思想,不能以谨严的哲学理论文章的形式正面阐述,往往附丽于文学作品的外壳上表现。”^{②9}因而,他提出“哲学—宗教—艺术一体说”来切入《桃花扇》主题思想研究:

我们为了研究的精细,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分门别类加以剖析,但不可忽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艺术等是一个整体。不明瞭此,对文学史上各别的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就难免蔽于一曲。对《桃花扇》的研究就是一例,晚近评论甲是乙非:众说纷纭,特别是对《桃花扇》的结尾,以侯李入道作结,更好象是一个谜。甲说这违反历史真实,乙说这正是历史真实……其实,袭用现代文学的术语,持现代文学的评论标准来研究古代文学,看来各方都可以言之成理,但这样的争论是难以求得确论的。

把历史上产生消长的各种宗教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说成是消极出世,并不符合宗教史的实际。由于宗教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史的一个酸果,中国的宗教史问题尤其复杂。本人尝

试从哲学史(侧重宗教哲学)的角度探讨孔尚任的创作思想和《桃花扇》的微言大义^{③0}。

张文的这种“大思想文化”研究范式显然完全“摆脱”了“阶级政治”论调,把文学研究完全从庸俗社会学范式中解放出来,这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全面“拨乱反正”时期可谓“意义深远”。

四、1999—今:立足文本文学性, 兼采多元批评范式

进入新的21世纪,关于《桃花扇》传奇主题思想的讨论还远未定论。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多元批评范式的流行,以及新的材料的发现,对《桃花扇》传奇思想主题的解读仍然如火如荼,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材料的挖掘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至21世纪初的20年,学术界不再受“庸俗社会学”方法论影响,而是从多种视角与方法进行立体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文本自律性,以文学的独立品性解读文本作品的意涵指向。有学者就敏锐地发现,只有立足于文本分析的“纯绝对”状态的解读才是《桃花扇》传奇思想解读的应有之义。首先发难的是李新灿,2003年他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从文本看〈桃花扇〉的反清爱国思想——兼与否定论者商榷》,认为《桃花扇》传奇是一部“反清爱国”剧,而非“拥清”之作。他立足于“文本自足”,从“老赞礼是作者的化身”“揭露了清兵的血腥罪行,暴露了清兵的凶残面目”“不标顺治年号——冷峻的‘春秋笔法’”“将清朝示恩怀柔征求隐逸写成访拿隐逸”“悲愤地总结亡国教训”五个方面与“否定论者”展开了特殊的“商榷”^{③1}。这种方法显然受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影响,即文学作品是一种既具有自律性又具有表现性的语言形式。但作者论述过程中仍未完全脱离“拥清”“反清”窠臼。

(二)以“儒、道”传统文化视角突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传统主题。2004年,贺玉萍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撰文《〈桃花扇〉:传奇,还是历史?》,指出《桃花扇》主题阐释的“多义性”呈现原因在于,很多学者囿于剧中所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未能体察作者孔尚任思想的深邃,笔法的曲回周折,以及作品在盛世唱衰歌对时代的超越,“鲜能体察作者真正的本意从而正确理解作品的主题”。他认为该剧主要表现“儒家思想的全面崩溃”与“道家理念的彻底幻灭”,以此来“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③2}。

(三)以意象、美学新理论重读《桃花扇》“兴

亡”主题。有学者虽然坚持传统的“兴亡”主题说,但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2006年,王昊在《一片痴情敲两断 桃花扇底送南朝——浅析〈桃花扇〉主题意象的美学功能》一文中言“我们从意象经营的角度指出,桃花扇既是经过敷彩、设色后渐次生成的复合意象,更是统摄全篇的主题意象。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把普通的定情宫扇逐步演进为具有丰富、深刻美学内涵的桃花扇,作者借助这一主题意象营造出弥漫全剧的凄美、感伤的艺术境界,完美地实现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意图。”^③王昊还进一步指出,“桃花扇”意象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象征着国破家亡之后的爱情幻灭感、人生虚无感和历史悲剧感”^④。

(四)从思想文化史视角反思《桃花扇》写作的“家国”“民族”思想及“道德”情怀。2019年,卢燕娟在《文艺研究》第8期撰文《作为文学叙事的明清鼎革——以〈桃花扇〉的写作、接受和重写为中心》,指出《桃花扇》的主题立意在于“思想的冲突”与“文化的裂变”。具体而言,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反思的结果是,“国”“君”“天下”内涵判然有别,“君王”不再高高在上,“国之亡”可“问君之罪”。特别是清代统治者更以“为明复仇”的道义法则为其“入关”辩护。这样,“君国一体、夷夏之防的观念渐渐让位于道德至上的观念”,《桃花扇》传奇正是这种思想在“文学”上的展现和明末清初遗民思想家的“家国反思”是一致的^⑤。

(五)借助新的文学批评范式对民国《桃花扇》主旨进行“批评再批评”,扩大了研究范畴。张芳2022年在《南大戏剧论丛》第1期所撰《艺术批评、现实批评与学术批评——民国〈桃花扇〉主旨批评研究》文章虽未超出民国“民族兴亡”主题说范畴,但却以“艺术批评”“现实批评”“学术批评”范式把研究触角伸向了民国时期发表于各类报纸杂志的《桃花扇》咏剧诗、随感、论文以及文学史著,体现出深受现代学术语境影响的21世纪学人对传统学术范式的一种超越。

总之,《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以“先圣后裔”身份歌颂侯、李爱情,书写南明兴亡,因清初文禁森严而用“春秋笔法”写“兴亡之感”,剧中思想意旨变得隐晦多元,自晚清以来的一百年间,关于《桃花扇》的意旨之争如同一个“谜语”,一时间“颂扬爱情”“兴亡之叹”“爱国思想”“现实主义”“民族精神”“拥清反清”“拥明寄托”“叛徒否定论”等主题说纷纷登场。笔者以为,不管《桃花扇》主题思想论争进行了怎样的“基因突变”,我们始终坚持“史料”与“文本”的统一,“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桃花扇》主题思想一定会更接近于“科学”与“真实”。

注释:

-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 ④ 黎因《〈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民族文艺》1935年第5卷。
- ⑤ 方遐君《〈桃花扇〉的民族气节》,《国防研究》1942年第1卷第1期。
- ⑥ 顾素贞《题桃花扇传奇后》,《香艳杂志》1915年第6期。
- ⑦ 章汤国黎《读桃花扇传奇感赋》,《大中华》第2卷第3期。
- ⑧ 陈庆惠《〈桃花扇〉二题》,《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
- ⑨⑩⑪⑫⑬ 朱万曙《近十年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
- ⑭ 洪柏昭《〈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
- ⑮ 井维增《〈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齐鲁学刊》1985年第3期。
- ⑯⑰⑱⑲⑳ 张乘健《〈桃花扇〉发微——从哲学史的角度论〈桃花扇〉》,《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 ㉑ 李新灿《从文本看〈桃花扇〉的反清爱国思想——兼与否定论者商榷》,《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 ㉒ 贺玉萍《〈桃花扇〉:传奇,还是历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 ㉓③④ 王昊《一片痴情敲两断 桃花扇底送南朝——浅析〈桃花扇〉主题意象的美学功能》,《中国戏剧》2006年第8期。
- ㉔ 卢燕娟《作为文学叙事的明清鼎革——以〈桃花扇〉的写作、接受和重写为中心》,《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

(责任编辑:赵建新)